



一九九二年中國教會的回顧

任澤民著

在香港這個通往中國的門檻住了三十年，我學曉了兩件事。第一，我並非中國問題專家；第二，許多自以為了解中國的人根本活在一派虛幻之中。要了解中國，必須從她的五千年悠悠歷史背景入手。

從一九七九至一九九二年

多個世紀以來，天主教會曾經四度嘗試將基督的福音傳入中國大陸。歷史將告訴我們，一九七九年應算是第五度嘗試的開始。

今次宗教活動的復興始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大三中全會，鄧小平重掌黨權，將黨的路線由「階級鬥爭」改回到「推動四個現代化」

的道路上。宗教人士亦因今次現代化而享有一點進行宗教活動的自由。雖然共產黨稱這為「宗教自由」，但似乎稱為「宗教寬容」更切合實際。統一戰線工作部、宗教事務局、天主教愛國會等等五十年代用以監管宗教的工具，亦隨之悉數重新登場。

一九八二年的新憲法以及政策文件，都反映出政府對宗教的策略。一九八二年憲法的第三十六條，較諸過往的憲法（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及一九七八年）有更全面的闡釋。舊日的憲法中僅有一句「公民享有信仰宗教及不信仰宗教，以及傳播無神論的自由。」但新的政策卻分四點論列，並指出政府只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

新憲法清楚界定宗教信仰自由與宗教活動自由的分別。其中對「正常」宗教活動的保護亦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不過，目前中國官方大致認同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但將信仰表達公開在崇拜中，就只在政府認可的教堂或聚會點舉行，方能算為「正常」。其他一切活動，無論是「地下」或在「家中」私下舉行崇拜，均有被冠以「反革命」之虞。

最能清楚闡述政府的宗教政策者，莫過於一九八二年二月公佈的《十九號文件》。文件仍以傳統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看法為基礎，聲稱中國是無神主義的國家，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條件成熟時，宗教自然會消失。另一方面，文件亦告誡黨員說，透過強硬手段使宗教在短時期內消失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文件亦提到，宗教界的主要任務是將信仰者及無信仰者團結在一起，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文件強調必須保存宗教的獨立自主，提防外國宗教反動勢力的干預，更點名指向梵蒂岡。

較諸其他馬克思主義有關宗教的言論，《十九

號文件》表現出較開放的一面。隨後幾年，多位教會重要人物先後到訪中國，包括德國的柯寧樞機、法國的艾切嘉利樞機、菲律賓的辛海綿樞機及香港的胡振中樞機。（艾切嘉利樞機當時是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的主任）。目前國內已有超過一萬三千所教堂及小堂，二十四所大修院及超過八百名大修生，三十七所修女院有超過一千名在學的修女。

雖然與梵蒂岡的正式交往沒法進行，中國教會人士仍不斷非正式地造訪海內外教會友好並進行交談。但一九八一年羅馬委任鄧以明為廣州總主教及一九九二年公佈龔龔品梅為樞機，仍不免遭到抨擊。

局面時好時壞；八十年代初期外國天主教人士所感到的和風，終於被一九八九年政府對「地下」天主教人士的鎮壓一掃而空。該次鎮壓是執行針對天主教會而發的《三號文件》。該文件標題為「在新形勢下加強天主教的工作」，加強工作許多時表示監管及控制。

在蘇聯解體及東歐共產主義下台之後，政府更

加緊握《三號文件》不放。鎮壓的受害者往往是地下教會人士。中國著著提防外國宗教活動及組織的影響，尤其害怕「和平演變」。

有些學者指出，中國的政治環境就是放寬和收緊的循環現象，這種情況亦反映在中國教會對外來訪者的接待上。在放寬的時候，他們樂於見到外國人，鼓勵人們增加往來，且可以公開地接受外界的捐款。但在收緊的時候，一切變得甚有保留，探訪流於表面形式，談話簡短且渴望探訪早點結束。探訪時往往有愛國會或宗教事務局的成員在場，而他們的態度也常反映出當時的政治氣候。有時，當局視接受外國捐助興建聖堂或教會建築物為愛國行為，有時卻指為觸犯獨立自主的原則及國家的體面。

我個人認為，八十年代的氣氛是從興奮轉化為審慎的樂觀。經過十多年後，天主教徒雖然明白到他們所身處的世界仍未完全自由、開放及獲得保障，但他們一直存有希望，亦同時對未明朗的前景處處充滿恐懼、憂慮、緊張及擔心。

一九九二年內的大事

一九九二年中國教會的變化，必須放在整個中國社會變化的大氣候之下了解。九二年一月十七日，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南下武漢，並於二月十九日到達深圳。鄧小平所到之處，一直不忘推動開放；當他到達上海時，開放之風大盛。儘管反對勢力竭力封鎖消息，但南巡的新聞仍到處傳開。

鄧小平於三月份將開放之風帶進人民代表大會。不過，人們關心的是，已屆八七高齡的鄧小平是否仍有時間及精力去實現他的夢想。一九九二年是歷史上關鍵性的一年，這是四十多年來首次有超過半數的中國工業產品由國家體系以外的單位生產。但問題是，中國能否在意識型態上保持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卻又實行資本主義。時間將是最好的裁判。

目前身居美國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前任社長許家屯於九二年六月份撰文指出，中國共產黨現正陷於危機。他認為鄧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開放並不徹底，

未能觸及政治及文化層面。這位仍自視爲共產主義者的資深黨員，認爲取法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及體制，共產黨的頑疾未必無法治癒。

幸好，九二年十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不再拘泥於意識型態問題。大部份人都將全副精力灌注到中國的市場經濟去。官員及幹部「下海」經商成了一時風尚。知識份子寄望市場力量席捲全國之後，會帶來政治上的改變。如何達致深遠的轉變，而又不至於引起混亂，似乎只有期待奇蹟發生。數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夢想當官；一九四九年以後，人們夢想成爲幹部；現在則夢想成爲企業家。

教會方面，前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天主教徒康原（John Kaam）曾說，「儘管過往數年中國在政治及經濟方面有所改變，但在對待教會方面尚未有任何根本的改變，只不過態度有點轉變跡象而已。」他說，政府仍將宗教人士及天主教會視爲潛在的敵人，可以引發社會的不穩，所以必須加以控制。所有過往的法例及規限仍舊生效，但有些幹部的態度

有所改變。也許當一些幹部感到現行的體制限制了他們，開始要設法保留自由市場經濟的利益時，許定屯所倡議的文化及價值觀改變才會出現。

這些改變現象是多方面的。中國的宗教領袖最近經已公開向到訪的友好要求經濟上的資助，以重修聖堂及其他建築物。中國呼籲海外人士投資到公私合營的企業上。中國鼓勵海外的天主教基金會與中國本地教會人士合作，而這些本地教會人士又與當地政府合作。新的工作項目通常包括診所、供水設施、鄉村學校、傷殘兒童的醫護中心、紡織工場及小型工廠等。有些人會質疑這些合作計劃的意義，但我以爲在中國教會這樣深受約束的環境下，也許這是中國海內外基督徒爲窮人及病患待援者提供服務及傳揚福音的好辦法。

中國天主教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

九二年最觸目的教會事件相信莫過於九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天主教第五屆全國代

表大會，共有來自三十個省、市、自治區的二百七十二位代表出席（包括六十八位政府認可的主教當中五十位），商討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務委員會三個機構的事宜。雖然原則上全國代表大會應每四年舉行一次，但實際上前一次大會卻已是一九八六年的事。

大會的主要議題有三項：主教團的章程；改組三個政府認可教會機構的架構；主教團及愛國會的人事安排。會上通過了主教團的章程，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成立於一九八零年，過往一直未有獨立的章程，其法律地位出於中國天主教主教務委員會章程的第七項。今次大會同時通過新的架構，在主教團之下設六個委員會，教務委員會成爲其中之一。大會亦通過修改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章程。

會議中，七十五歲的宗懷德主教同時獲選爲主教團團長及愛國會主席。他同時更保留教務委員會主任的職位。

根據新架構，主教團與愛國會似乎獲致同等地

位，而愛國會似是一個協助教會辦事的機構，多於主宰教會事務。過往，愛國會常遭人批評爲幫助政府控制教會而非發展宗教；今後如何，有待觀察。九月份的會議之後，有些人對會議作出正反各方面的評價。正面的評價如下：

主教團首次有正式的章程。

大會議決在全國推行中文禮儀。

各地修院在徵得修院董事會的同意後，可以聘用海外的教師，修生亦可以前赴海外進修。

主教團不但重視男修生的培育，也注重修女的培育工作。

承認宗座聖伯多祿首席權的地位。教宗是整個天主教會的精神領袖。

新成立的常委會顧及區域平衡，包括汕頭的蔡體遠主教、海門的郁成才主教、沈陽的金沛獻主教，分別代表南方、東方及北方。

主教團享有更大的權力去處理重大事情，諸如人事安排及修院的課程。

主教團可以更容易與海外的宗教人士交往。

將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置於主教團之下，有助於主教團落實他們的決定。

司鐸身份不相稱的神父及主教遭到勸退。

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李震神父說，新的主教團體令他感到，管理著中國大陸上教會的教會實體較前更真切，較令人容易接受。但他亦指出，假如教會仍為中國政府所控制，則一切都只是「新瓶舊酒」而已。一直以來，許多天主教徒亦對愛國會的控制感到不滿。

至與負面的評價，有以下的幾點：

主教團的團長及副團長並非一如聖教法典所指出，由主教互選產生，而是由包括神父及教友在內的所有與會代表選出。再者，現行聖教法典強調，每位主教應向教宗負責，而非向主教團負責，因主教團只是協調及交流資訊的組織而已。

天主教代表往往要先得到政府的批准才當選。

主教團章程的第二項及第九項，可以令到主教團或主教團常委會有權去限制地方主教行使正常的權力。

主教團與愛國會的關係僅說是合作性的，未有清楚界定如何運作。

在推行中文禮儀時將遇到不少實質問題，諸如應新的抑或舊的禮儀年曆等。

誠然，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帶來不少新的希望，但教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並未有大的變。按「收放理論」，中國目前在放的階段，人們可以享有較多的自由及開放；事情會否起突變，我們得拭目以待。

中國官員對於觸動到共產主義原則或政策的任何交談或挑戰，仍顯示出極度敏感。為他們來說，人權、民主及自由等等，並非大家可以自由探討的問題。我相信中國仍有熱誠的共產主義信徒，相信共產主義可以協助人們改善生活。不過，假如落實民主、自由，以及聯合國的人權法案，則影響一黨專政，而五千萬共產黨員的優越生活亦將隨之而結

束。因此，黨內上下眼看蘇聯及東歐的變天而有所警覺，在各方面立意堵塞挑戰。

他們顧慮激進份子、學生、學者以至工人等任何可能組織起來的團體，怕他們引起挑戰。教會亦是他們顧慮的對象之一。不過，即使天主教會可能有千萬的教徒，但相對於中國的龐大人口來說仍然十分細小。由於這個團體堅守著其原則及信念，與國際基督徒團體有著密切的關係，且明認忠誠於教宗的權威，因此政府仍未把她視作盟友，儘管政府也不想疏遠她。

內部分裂

天主教會雖然是由具有誠意的人所組成，但不幸地卻存在不少分裂的因素。地下教會對公開教會的不滿，主教之間亦有不少的分歧，甚至地下教會內部亦有不少分歧。有些地方同時出現二至三位主教，各自聲稱自己是合法的。情況令到親痛仇快。

地下教會與公開教會之間的決裂淵源甚遠，並

不能都歸咎於共產黨人，也應該由教會本身撫心自問。他們往往互相攻訐，拒絕交談及散佈謠言。公開教會指責地下教會人士不理解他們維持牧民工作及保持聖事得以延續的動機。他們認為外在向政府順服與內心對宗座效忠並無矛盾。不過，地下教會卻認為任何妥協都損及信仰。他們從教會的合一出發，心恐教會一旦與羅馬關係中斷，會產生信仰及信理上的改變。他們一直致力禁止信眾到公開教會參與彌撒或領受聖事。有些人甚至威脅公開教會的主教會受到絕罰。

在某些地方，例如華北的河北省，雙方的關係嚴重對立，政府的干預亦十分嚴厲。在另一些地方，雙方的關係則友善得多，有些彼此之間的界分並不清晰。近年來，有關地下教會的資訊比較充足。在某些地方，他們的力量日漸壯大，也變得有些激進及欠缺包容。他們有些人設立了修院及修女院。一九八九年他們甚至成立地下教會的主教團。不幸的是，有些地下教會的領導人所受的培育不足，導致

判斷失當、誤解及紛爭。

這種分裂令羅馬處於困難的局面。偏幫任何一面都會加深修和的困難。支持地下教會的話，就表示承認一個缺乏組織及分散的團體，以及捨棄公開的教會，亦將導致羅馬與北京之間的談判無從進行。如果支持公開教會，則表示捨棄那些決心忠於羅馬的人，而向北京的要求屈服。

這種矛盾的處境有甚麼出路呢？沙百里神父在巴黎外方傳教會最近一期通訊中指出：「修和必須建基於能活出互相信任及互相開放的寬宏愛心之上。要克服目前困境所需的靈修力量實際上已存在於中國天主教會之內。無論他們是愛國份子或是地下份子，都虔敬中華之后教會之母。這位救主之母將知道如何令到她那些分裂的子女復合在一起。」

道德上的挑戰

教會能對當前歷史中的中國人民有甚麼貢獻呢？

據香港的報章報導，慶祝聖誕開始成了中國人的重

大活動之一。人們互贈賀咭及禮品，有些人亦在這非法定假期自行放假。不過，這個慶節的商業化傾向顯然未有觸及精神層面，因為在中國對基督有所認識的人並不多。許多人相信人們熱衷於過聖誕，只是反映出中國人社會的精神空虛，沒有可堪寄托的地方。

目前，甚至連政府的宣傳工作者亦談論到中國的「信心危機」這個最令人憂慮的問題，人們缺乏道德體系去衡量對錯。許多老一輩的中國人仍相信傳統的儒釋思想，有些中年人也對馬克思主義存有希望。但今日的年青人卻早以摒棄共產主義的信念體系，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任何可替代的物品。一位旅美的中國學者於一九八九年向一群青年講話時指出，今日的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的重大道德混亂。他進一步指出，領導層的政治解體、嚴重的貪污、缺乏意識型態信念、家庭制度的解體，以及商業化的傾向，導致人們失落及迷惘，也產生精神的空虛及道德的混淆。

台灣作家柏楊在其暢銷書《醜陋的中國人》內指出，道德沒落未必是最深重的危機，真正的危機是中國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無法找到解答道德挑戰的答案。他相信中國文化的本質令到中國難以適應現代世界。崇尚物質的自我利益主義，成了今日的主流思想。儒家所注重的倫常關係、安和利樂等仍是人們的主要世界觀，但卻沒有地方可以為人們提供道德操守的指引。我最近一次訪問中國時聽到，許多年青人及知識份子因感到空虛而前來教堂，看看有甚麼可以作為生活意義的指引。一位年青的學生說：「我們所處身的世界浮面而虛偽。我們希望在生活中找到更深的價值。」

對於目前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有人認為是基督宗教的「黃金時代」。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國新聞分析》中，作者指出基督宗教可以成為人們另一項重大的選擇，因為它具有共產黨所缺乏的吸引人之處。不過，歷史亦告誡我們要認真思考基督宗教是否最佳及唯一的答案。目前中國的

基督宗教是否經已充份「處境化」亦成問題。有些中國知識份子，例如深圳大學的劉小楓，成了文化上的基督徒，他們信仰耶穌基督，但卻拒絕受洗加入任何教會。再者，政府的反對亦驅使教會成為一個少數派的次文化，最起碼目前就是如此。

無疑，中國教會目前仍是少數團體，且承受著內部及外間分裂的困難。不過，到訪過中國教會的人士，大概都會和我們一樣，對她懷有深厚的尊重及敬意。我的個人看法並非判斷。絕大部份年長的天主教徒，無論他們屬於公開教會抑或地下教會，都曾飽經苦難。他們的信仰為他們至為重要。一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馬尼拉所說，「我們對他們所承受的苦難，實在敬佩不已。」人們看到中國教會致力確立自己成為基督奧體的一個肢體，將感受到中國教會內深潛的熱力及動感。也許中國教會一如她的締造者同樣，必須經歷整個巴斯卦奧蹟，首先承痛苦及死亡，然後才復活進入新生。我們就像宗徒一樣，受到召選去為這奧蹟作目證。